

# 請按本來面目作評論

● 梁培恕

早年，我父親曾經嘆息社會上對他誤解太多，如果有朝一日略得寬暇，能夠寫文章說說自己的本意，是一大快事。

我著文回答許紀霖先生的文章〈梁漱溟——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反現代化烏托邦〉(《二十一世紀》總15期)，並非因為文中評論到了我的父親。如果許先生文中所言為事實，無論作怎樣的評論，我都不會說話，換言之，不符合事實，只得說話。

說梁漱溟是「文化民族主義者」有一點像，說他「烏托邦」原屬事實，說他反現代化卻沒有說對。

## 自行塑造一個梁漱溟

我沒有一上來就決定作答。看第一遍，覺得說我父親是「文化民族主義者」有一點像，說他「烏托邦」原屬事實，說他反現代化卻沒有說對。不過這種看法頗流行，看過放下，幹別的了。

放下之後又覺得不對勁，我的父親在許先生筆下怎麼和他本人半點都不像了呢？又看一遍，原來許先生把

他的精神面貌給改了。轉念又想，有幾個人有機會像我這樣熟習他的精神面貌？無足怪的，又放下。

突然，想起許先生說他「偏要逆水行舟，為釋迦和孔子爭得一席之地」，我記得原話是為釋迦和孔子「說個明白」。選用「爭」字自然是有含意的。順着這個思路，再仔細看第三遍。起初我以為許先生是手邊資料不全，以致所得印象有誤，但從末尾註釋看，許先生至少已讀過《梁漱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第一和第二卷，從撰文的時間看應可讀到三、四、五卷，即許先生用以作評論的資料大致已齊備。這樣，我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何所取而拋開事實自行塑造一個梁漱溟作所謂的評論呢？

雖然如此，我用來回答許先生的資料，盡可能出自一、二卷，凡出自其他卷帙，必作注明，以示所言有據。

許先生的不公正，首在略去我父親思想發展的重要過程，以便寫成適合其所預設的結論。

## 略去了甚麼，寫成了甚麼

《全集》第二卷首篇是〈自述〉，專講我父親的思想發展過程。然而，許先生在談論時卻只引〈我的自學小史〉，並將〈小史〉中凡不符許文所言的棄而不顧。

許先生第一步「坐實」我的父親是實利主義、功利主義者。

許文說「其父梁濟是一個頗有墨俠精神的儒生，他在國難的刺激下，形成了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給青年梁漱溟思想的發育以極其深刻的影響」（按應為幼年），又以濃筆重彩二百餘字續作描述。許文將〈小史〉中講父親轉向佛家的話略去，給人以他一直是功利主義者的印象。

我父親在〈自述〉中自然也講了功利主義，在講轉向佛家之後有一段話，如下：「我的至狹隘之見解（按指功利主義）幾經變化才得解放。」第一度是受同學影響，第二度是自己看佛書，「發生厭世、出世的思想而轉變了我之為人」<sup>①</sup>。原文說明共分三點，為免引文過長，這裏僅介紹其第二點，即「早先的事功派心理極易朝反方而趨於消極」，「根本否認人生，更不講實利」。他從十四、五歲起讀佛書，二十八歲放棄出世，其間寫了《究元決疑論》。

他已「朝反方向」去了，許先生筆下卻是原地不動，豈非不尊重事實？許文接着又略去另一在〈我的自學小史〉和〈自述〉裏都曾講到的思想發展過程，即「激進於社會主義」。這是夾在佛、儒思想之間的一段思想發展。佛——悲憫眾生，社會主義——沒有人壓迫人，思想感情上同出一源，解決之道則是一為離開，一為投入。由於當時出世的意願更強，我父親只

一度激進於社會主義。後來，他因歸宗儒家而帶着對合理社會的嚮往留在世間。許先生既評論其為烏托邦，卻又無視、曲解其中思想的成因，實非合理。

在跳過上述兩個重要思想發展過程之後，許先生終於提到「未過幾年他又由佛歸儒」。為甚麼呢？沒有講。只是一筆帶過便進入其人「以事功為尚」的主題，以為歸儒是「父子同時具有淑世的和道德的雙重熱忱，這也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人格理想」，致力鄉村建設運動是「按照其內聖外王的儒者性格」做的，最後還得出「不僅想成為精神上的內聖，更想充當人世間的外王」的結論！我是真的不知道儒家思想和「內聖外王性格」之間有甚麼必然的（在許先生筆下是直接的）聯繫，以及儒家思想是否用「內聖外王」就可概括得了。

既然許先生略去了由佛歸儒這個決定性的思想轉折，那麼只好由我來補敘了。

〈我的自學小史〉最後一節是「回到世間來」，講歸宗儒家的動因。「當初歸心佛法，由於認定人生唯是苦（佛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一旦發現儒家《論語》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個苦字」，提到了憂，卻是說「仁者不憂」，「樂以忘憂」，「其充滿樂觀氣氛極其明白」，「經過細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片面的看法」<sup>②</sup>，不再單從消極面看人生，把佛儒相通、相同的方面在自己行動上統一起來，統一於無我。

許先生再次略去這思想發展的重要過程，卻斷言梁漱溟由佛歸儒乃是追求事功，這是不應該的。需知人的思想、行動無一不存在前因後果，其

許紀霖先生的不公正，首在略去我父親思想發展的重要過程，以便寫成適合其所預設的結論。

許先生沒有正視我父親由佛歸儒的前因後果，他筆下的梁漱溟不曾存在於世界。

間關係有如鍊條之環環相扣，有如階梯之層層而上，缺了幾環，拆去幾級，不僅不成其鍊條、階梯，世界上乾脆沒有這樣的事物。當然也沒有這樣的人。許先生沒有正視我父親由佛歸儒的前因後果，他筆下的梁漱溟不曾存在於世界。

## 人類文化三大系假說的由來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最受注目也最受爭議的是，提出了人類文化三大系（亦稱三種路向），即：（一）向前面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合、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西方、中國和印度分屬這三大系。

在許先生看來，這個假說的提出，背後隱藏了一個護衛民族文化的動機。許先生的表述摘要於下：那是「以二元式的理論預設，試圖緩衝這種歷史與價值的內在矛盾」，是「巧妙地迴避了二者（按指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孰優孰劣的價值選擇」，是「又以一元主觀的觀點，設定人類文明存在着西洋文化到中國文化再到印度文化的發展序列」。許文繼而指出我父親用這種辦法暫時安頓了「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順應現代化大勢」和「護衛本土文化」的「雙重渴望」。這樣的表述實在有「閉門造車」之嫌。

我父親對他的學生們回憶自己憬然有悟於人類文化可分為三大系的過程是生活化的（整理成文即為〈自述〉）。他說：「令人感覺奇巧者，即是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可謂為西洋的思想，第二個時期可謂為印度的思想，第三個時期可謂為中國的思想。彷彿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腦海中巡迴了一次。」<sup>③</sup>（此過程因許先

生略去已由我補敘，見前）。

為進一步說明三大系觀點出自他的而非另外某人的腦海有其緣故，下面再從〈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中引幾句話（收在《全集》第七卷，1993年8月出版，許先生撰文時尚未及見）。這個關鍵就是祖父送他去北京最早開辦的新式學堂讀新編的課本，至於學童們用來開蒙的《論語》，他是二十歲以後才自己找來看的，十幾歲時以一個未受儒書影響的頭腦隨意找書看，「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麼，我將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割然各具其特色異彩的。我或將囿於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將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sup>④</sup>。

由此看來，他之提出三大系出之自然，甚且有點出之偶然。

個人體驗是不完整的，也不是人類認識事物，尤其是複雜事物的終點。所以我稱三大系為假說，因其尚待深化、驗證。不過他所說的經過何其親切、真實，我們是否更應相信他的話？

## 何以像是「文化民族主義」

許先生寫我的父親從贊成西化直接轉入反西化，並謂此表現為文化民族主義；又說三大系的提出為新舊兩派留下了「批評的口實」，於是「思想中那種內在的心理緊張一如既往」，便「在一元論整體主義文化觀支配下」放棄西方化，「走向內治完整的保守主義一路」。這個分析建立在許先生以自己的心理揣度他人上面，評論日

許先生寫梁漱溟從贊成西化直接轉入反西化，並謂此表現為文化民族主義。這個分析建立在許先生以自己的心理揣度他人上面，評論日常生活尚可，探討學術就嫌輕率了。

常生活尚可，探討學術就嫌輕率了。

雖然如此，說我父親是「文化民族主義者」，有一點像。像在哪裏？說他不是，不是在哪裏？

的確，他大膽預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屬於中國文化。此外還有許多讚美固有文化的話，這類話後來說得更肯定。1930年他說自己糊塗，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認為中國可以從全盤西化得救，只是需要時間，慢慢趕上來。後來他不再認為中國可以從摹仿西方得救，因為中國的精神高於西方，高的勉強向下學，結果是無益有害。

這就是說他像文化民族主義者的緣故。說他不是，是因為上述說法只是他全部觀點的一半。

實際上，說世界文化的未來屬於中國文化，是本於人類不斷進步這個觀點而非僵固觀點說的。他對三種文化的長短各有評價，想摘引讚美的話不難，想摘引批判的話亦同樣容易。這個觀點的關鍵在於：人類處於甚麼進化階段，便應該用與之相應的態度（文化）去生活。他因此肯定人類在當前階段應該用西方的態度。中國沒有用這種態度對待生活，以至科學、民主沒有在中國產生。中國人在調適自己精神生活方面的成就高過西方，但這種成就無濟於中國當前的危難。當人類過完了人對物（征服自然）這一漫長歷史階段以後，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文化）就適宜於那時人類生活的態度了。所以，他的意思完整表達起來是：西方文化在現階段將世界化，而中國文化將在未來世界化。本着這個觀點，在極遙遠的未來，印度文化將世界化。

只有僵化看問題，拒絕其他文化的，才是文化民族主義。我父親期望

作到把「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具體事實上的溝通調合。……溝通調合成一事實」<sup>⑤</sup>，即一新的文化。

說中國文化高於西方文化，這也許和普遍的感覺或認識相反。為說明這一點，與其從頭介紹他的觀點，不如引《人心與人生》緒論中的一段話，使讀者了然於「高」和「低」是指甚麼說的<sup>⑥</sup>：

科學發達至於今日，既窮極原子、電子種種之幽渺，復能以騰遊天際，且即攀星登月，其有所認識於物，從而控制利用乎物者，不可謂無術矣。顧大地之上人禍方亟，竟自無術以弭之，是蓋：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於行止進退之間，殆未能也。

所謂西方文化高，是針對其主宰乎物這一面說的；而人禍方亟無術弭之，則又足見其低。中國文化高在人能自主於行止進退之間，卻於主宰乎物不行。

上面這段話寫於70年代初。由此可見，無論20年代或五十年後，我父親的認識一直是中西文化互有長短。

在《中國文化要義》緒論裏，更有一段話講到何謂固有文化：「文化本從傳遞交通而有，於此求『自有』、『外來』之劃分，殆不可能。」意思是嚴格說來幾乎沒有固有文化這種東西。「不過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國受變於西洋太大，幾盡失其故步，大略劃取未受近百年影響變化之固有者，目為中國文化，如是而已」<sup>⑦</sup>。

「文化本從傳遞交通而有」。這裏既無固執亦無偏執。料想文化民族主義者應不是這樣。

所謂西方文化高，是針對其主宰乎物這一面說的；而人禍方亟無術弭之，則又足見其低。中國文化高在人能自主於行止進退之間，卻於主宰乎物不行。

## 不要無條件現代化

許先生判定他是文化民族主義者，然後往下推論，「按照其文化民族主義自身的理路，必然會徹底放棄西化，走內治完整的保守主義一路」。但是，既然第一個推斷不能成立，第二個推斷——反現代化便「必然」不準確。

許先生注意到他在西化問題的看法上有改變。1921年時說贊同全盤西化，幾年以後說中國民族精神不合於西洋政治制度。這的確是一個重要轉折，不過不是折向保守，而是折向為中國培養可以融取西洋文化的新文化。因為形勢擺在那裏，中國退不回去。至於中西文化的精神不合，我們就得在使它調合上想辦法。他知道這是一條迂遠的路<sup>⑧</sup>，然而，為了民族自救，即使迂遠也得要走。至於工業化問題，他曾指出中國若不工業化便不能「翻身」。

不過且待講一下現代化問題，再講「翻身」。

許先生的文章裏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價值」，使「文化保守主義者」對現代化產了新的「警惕」。

其實「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在大戰前已為人所知，不過這場災難更促使西方人士反省自己的文化，成為一時的思潮。這的確使中國知識份子增加了「警惕」。但又何必一定是保守主義者？不少人豈不是因為看到這「負面」而轉向馬克思主義嗎？至於我的父親，他不是經歷了佛—社會主義—儒這一思想、認識上的發展過程嗎？這三種思想無一不反對非人性。他不願中國無條件的現代化，就

是不想使「非人性負面」重演。

這是一個心願，一個追求。此外還有一個心願，不過當時在他看來是不可邁越的事實，即所說中國人對西方精神的拒卻（不合）。這不可邁越其實是他珍惜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緣故。歷史絕不多情。

在民國的政治條件下，他設想並試着以漸進的方式使中國人習慣（接納）西方精神。接納這精神的目的，是使民主和科學技術在中國土壤生根發芽。在他心目中符合了這兩個條件，才是可行於中國的現代化。

在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條件下，此一心願是受批判、不允許的第三條道路。固有文化幾經滌蕩，幾乎成了記憶中的東西。

1980年，為他作傳的美國史學教授艾愷(G.S. Alitto)問他：「你覺得四個現代化這個計劃對中國文化有無甚麼影響？」回答是：「中國生活在現在的世界，它不能違反潮流，它只能往前走，把物質文明發達起來，那是需要的。」<sup>⑨</sup>

說這話時，改革開放剛開始，其負面價值還沒有顯露。但縱是顯露又怎樣？這件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不過我們所說的是他的思想。就思想而言，他不反現代化，期望並曾着手試過沒有負面價值的現代化，並預期是社會主義的。

## 不只是道德烏托邦

說「試過」沒有負面價值的現代化，是指他早年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而言。戰爭使我們未能看到這個試驗事實上的結論——結論仍然可以得出。

我父親不願中國無條件的現代化，就是不想使「非人性負面」重演。

1930-1937年父親先在河南後在山東進行的鄉建工作，他稱爲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許先生則將之稱作「道德烏托邦王國」。冠以道德二字的王國，自然是唯此爲重，忽視其他方面。然而，許文卻是真正忽視了其他方面。《鄉村建設理論》分爲甲部「認識問題」和乙部「解決問題」，若以診病比喻，甲部像是病歷，乙部像是處方。乙部「經濟建設」項下，分爲十一節，把中國如何「翻身」作了詳細的設計。許先生於此未下一字的針砭，這等於把別人開的處方藏起一半。

《理論》講經濟建設從「且看今日國際大勢」開始。大勢是指第二次產業革命後，生產力增高，競爭更趨激烈，不發達國家所受壓力更大，中國走從工商業發達起來的路已被堵死，而「中國要翻身起來達於進步健全的經濟生活……其關鍵則看能不能工業化」。文中又謂，如果中國工業是由農業生產和農民消費刺激起來的，就會有生存能力。他還注意到當時中國農村已有五千五百萬無形失業的農民（因耕地不足），如果把工業建在鄉村，農民就得以「兼事工業」⑩。

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裏為止，僅在證明鄉建運動並非只是道德烏托邦。

「他相信人性是善的」。這句話許先生說對了。

若把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不包括階級狀況），以及討論經濟建設的觀點和共產黨的觀點相比，不難發現其中多有相同、相近的地方。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達到目的的手段就不一樣了。本於佛家，他不忍殺生；本於儒家，他相信人性善。

鄉村建設運動有三個最爲理想主義的原則，都是建立在性善論上的。

如：擴展工作全賴教育，「如果教育盡到其功用，論理社會上不應當再有暴力革命，因為社會出了毛病，教育隨即修繕改正」⑪。守定在野的營壘，不自操政權。中國大大小小的政府（按指30年代）「本身正在問題中，絕非解決問題的動力」⑫，當鄉村建設運動起到改變社會大勢的作用時，「政府權力隨之減縮，或變易其性質……」⑬。「暴力破壞只會使社會沉淪淹滯」，「不承認在民族社會內使用暴力的理由」⑭。

他期望中國出現新社會，那時，「中國融取西洋近代兩大長處，但所成就則殊不同於近代西洋社會，此蓋以科學技術之發達的途徑不同」⑮。

我僅以原原本本介紹我父親的思想、動機回答許先生而不加申論，還以其本來面目是我僅有的目的。許先生把文章寄到香港來發表，這是可以說真話的地方，利用這個條件也講講我父親的本意豈不好？

我父親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把中國如何「翻身」作了詳細的設計。許先生於此未下一字的針砭就把鄉建運動稱作「道德烏托邦王國」，這等於把別人開的處方藏起一半。

#### 註釋

①②③⑤⑧⑩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頁7-8；698；9；278；478；508。

④ 《全集》，第七卷，頁184-85。

⑥⑦ 《全集》，第三卷，頁526；10。

⑨ 《全集》，第八卷，頁1143。

⑪ 《全集》，第五卷，頁433。

⑫⑬⑭⑮ 《全集》，第五卷，頁1038-53。

梁培恕 1928年生，歷任記者、編輯，1990年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